

英 汉

张安德 杨元刚

词语文化对比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ultures in Word Expressions

湖北教育出版社

英 汉

张安德 杨元刚

词语文化对比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ultures in Word Expressions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汉词语文化对比/张安德, 杨元刚.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5351-3367-3

I. 英… II. ①张… ②杨… III. 词语-对比研究
-英语、汉语 IV.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8424 号

出版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 430015 传真: 027-83619605
邮购电话: 027-83669149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190 千字

(430015·新华下路 192 号)
5 插页 8.5 印张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5351-3367-3/H·130

定价: 16.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言

近日,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安瀛教授和他的同事杨元刚副教授完成了新作《英汉词语文化对比研究》,年内将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安瀛教授请我为之作序,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沉甸甸的书稿,我想起了“五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古话,仿佛感受到了字里行间飞扬的文采、浓缩的深思和浸润的汗水。

英汉对比语言学在中国目前是一门“显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研究角度越来越广,论文著述的分量越来越重,张安瀛教授和他的弟子兼同事杨元刚副教授的这本著作前后历经五年才完成,作者主要运用文化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中西跨文化角度研究英汉语言中的文化词语,以语言与文化为横坐标,以历时和共时为纵坐标,将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进行多维度分析,从文化现象去阐释语言,研究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模塑的关系,探讨文化对语言的形成和制约作用以及英汉语言的人文属性,同时又从语言现象去阐释文化,从历时的角度研究语言中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重点观察、分析、总结英汉语言中的国俗语义词——如数字词、植物词、色彩词、称呼词等的联想重合、联想对应,联想空缺与联想碰撞,寻找英汉两种语言间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同时从共时的角度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语音、语义和语法方面的

相互渗透和影响,如借词和词义的扩大、英汉委婉语构成方式对比等,把抽象的辨理和具体的材料相结合,使论证有理有据,该书探讨了英汉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对英汉语言的学习、运用与翻译的影响,举例翔实、论证深刻,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英汉对比研究学界呼吁创立英汉文化语言学,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地在英汉对比方面做些研究。早在1994年,杨自俭教授就对对比语言学下过一个被大家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定义,他认为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兼有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是对两种或多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对比研究,描写并解释所对比语言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用于理论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张安瀛教授与杨元刚副教授所著的《英汉词语文化对比》一书体现了杨自俭会长所倡导的对比语言学研究的三个特色,即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理论研究使应用研究厚重扎实,应用研究使理论研究充满活力;描写与解释相结合,不仅使人知其然,又要使人知其所以然;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是包含共性的特色显现。张、杨二位先生所著应当属于对比语言学下面英汉对比语义学的范畴,该书从总体上看应用的特色浓一些,我一直认为英汉对比语义学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英汉词义的褒贬、宽窄、新旧、风韵、国情、语用等一系列奥妙的差异以及英汉词义之间的对应、重合、碰撞、空缺等关系常常难以把握,在双语词典中也得不到反映,对于第二语言习得者来说,他们常常望文生义,张冠李戴,犯些语用错误,在这种背景下《英汉词语文化对比》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本书适合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和从事英汉对比研究的学者学习或参阅。

读这本书稿的同时,我还有一个感受,那就是吕叔湘先生所

谈的“英汉两张皮”的隔膜。由于几十年来我们教育体制的局限性,学习英文的人忽视汉语的修养,而学习中文的人呢,又往往英语功底又不深,在这方面我们急需补课,英汉对比语言学是一门跨语言与文化,跨英汉的交叉性学科。潘文国先生指出,从事英汉对比研究的人,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现代英语知识,二是现代汉语知识,三是普通语言学知识,四是汉英语历史文化知识,愿所有有志于英汉对比研究的人都加强自己的学养,把我们的英汉对比研究事业进一步推向深入,为 21 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 连淑能

2002 年 7 月 8 日

前 言

一、国外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以来,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用历时的和比较的方法研究探明了世界上很多语言的历史发展和它们在始源上的关系,把世界众多语言分为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高加索语系、德拉维坦语系和闪含语系七种,从此语言学从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中独立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呼吁人们回到传统语法共时研究的角度,揭开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序幕。作为承前启后时期的人物,索绪尔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历时语言学家,又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的建立是以1916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为标志的,在这本书中,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

在现代语言学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有两股学术思潮

交替出现,一种是关于语言形式的研究,另一种是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这两股思潮的源头同时出现。1911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第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同年6~7月间,他主讲了语言理论的中心思想之一《静态语言学:几个普遍性原则》,索绪尔长于理论创新,提出了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聚合与组合、共性与个性、价值与关系五大对立统一的范畴。同年,布拉格学派创始人马泰修斯在波希米亚皇家学会做了一个题为《语言现象的潜能》的报告,他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和语言结构的思想,倡导对现代语言进行共时研究。不过马氏认为,语言是为某种特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系统,语言有社会功能和表情功能两大作用,他主张用功能的观点来对语言进行研究,提出了实义切分法,即主题——话语切分法。还是在1911年,美国人类主义语言学家、美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博厄斯(F·Boaz)编写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第一卷出版,在《手册·序言》中,博厄斯详细阐明了调查和描写印第安语的原则和方法,三位大学者在毫无联系的情况下,不谋而合地发表了与历史比较研究相对立的见解,号召人们对语言进行共时分析,研究语言在一段时间内的全部共生态,这标志着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从此,语言学家逐渐告别了历时的、比较的方法,慢慢转向语言的共时的、描写的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分三大流派,即马泰修斯(Mathesius)创立的布拉格学派、耶姆斯列夫(Hjelmslev)创立的哥本哈根学派和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创立的布龙菲尔德学派,其中以布龙菲尔德为领袖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最大。布龙菲尔德学派信奉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说,反对冯德的心灵主义学说和内省法,他把语言看成一种刺激——反应行为,即S—r—s—R的

过程,其中 S 和 R 是外在的刺激反应, r 和 s 是语言的替代性刺激和反应。布龙菲尔德学派反对从意义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认为语言意义的主观性比较大,以意义为基础的语言研究最不具有客观性。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是一种行为,主张用观察描写的方法对搜集到的语言素材(corpus)进行归纳和切分,把语言分成音位——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六级来进行研究。布龙菲尔德学派一直反对对语言进行意义研究,所以这一派对形态学(morphology)的研究比较充分,他们把语素分为自由语素和粘着语素,而对句法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具有比较丰富的印欧语系语言形态学特征。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一个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它由语音、语法、词汇、语义四大部分组成。结构主义语言学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用归纳法对语言的个性进行研究,主要贡献是音位学(phonemics)和形态学,他们把语言学变成了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总结了一套整语言描写和分析的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了《句法结构》一书,建立了经典理论,从此结构主义逐渐让位于转换生成语法。乔姆斯基认为,描写只能是语言研究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描写只能从事实中归纳出个别语言的规则,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人类语言生成的规律,即存在于一切民族头脑中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乔氏的研究重点是句法,他力图用公式化的语言描写语言生成的过程,在经典理论和标准理论阶段,乔姆斯基这一派也不注重语言的意义研究,他们认为合乎语法和合乎意义是两回事,在扩展的标准理论阶段,乔姆斯基才开始研究句子的意义,改变了标准理论中表层结构不参与句子的语义解释,以及语义规则所需要的全部语义信息只由深层结构提供的程式。在扩展的标准理论中,乔氏提出了

逻辑式的概念,认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共同参与句子的语义解释。这是一个进步,表明他开始关注句子的语义研究,不过他仍未改变他的基本立场,转换生成语法仍认为句法是中心,而语音和语义以句法为中心,这二者不像句法那样具有生成性。布龙菲尔德长于实证,善于用归纳法对语言个性进行研究,具有方法上的可操作性,而乔姆斯基则疏于实践长于理论创新,他善于用演绎法对人类自然语言所具有的共性进行研究,具有理论上的烛幽发隐的解释力。后来,Postal 和 Lakoff 突破了乔姆斯基以句法为中心的传统,另立门户,创立了生成语义学,他们认为,语义是语言的研究重心,语义具有生成性,句法以语义为基础,语音又以句法为基础,生成语义学是对转换生成语法的丰富和发展。

如果说 18 世纪是哲学的世纪,19 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20 世纪上半叶是结构主义一统天下,那么 20 世纪下半叶则是转换生成语法独领风骚。不过有些语言学家始终没有忘记对语言进行内容和功能的研究,因为语言学本身是由语音、语法、词汇和语义四大块组成,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都是对语言进行系统内的研究(inter-organism perspective),他们剥夺了语言系统的人文社会属性,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封闭而又纯一的符号系统,这是与语言事实不相符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语言的使用必然会打上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烙印,所以,语言既是一种知识、一种技能、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事实上,从现代语言学诞生的那一天起,语言学家就不断地对语言进行宏观上的研究,力图阐释语言现象背后的人文社会属性。例如,作为现代语言学鼻祖之一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就认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密不可分,一个民族的语

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耶姆斯列夫也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句法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音研究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语义研究语言使用者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他要求人们从语音、语义和语符三个方面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研究。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还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认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它影响和模塑着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在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语境”的概念,认为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伦敦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在韩礼德手中发扬光大,终于演绎成了举世瞩目的系统——功能语法,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即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目前这一派的研究中心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20世纪中叶,一方面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令人振聋发聩,揭示了句法生成性和解释力,另一方面,社会语言学的波涛在暗中涌动。从20世纪50年代起,现代语言学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从语言语言学的研究转向言语语言学的研究;二是转换生成语法一花独放、其他学说百花争春的局面形成,语言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虽占主流,但人们对语言内容和功能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三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的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现了许多带连字符的语言学,人们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美国出现了海姆斯的跨文化交际学,英国出现了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前苏联出现了语言国情学,法国出现了话语批评,这些不同的流派、不同的理论与主流思想相互激荡,使现代语言学变得更加成熟。人们不仅关心历时研究,也关注共时研究;不仅注重语言的形式,同时也注重语言的意义;不仅注重描写性,也注重规定性;不仅重视实证的归纳,同时

也重视理性的推演;不仅重视理论创新,同时也注重教学语言学的连贯性。这些思潮相互激荡后撞击的火花,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涌入中国,终于掀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的中国浪潮。

二、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对比研究:宏观与微观并举

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向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1898 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先河,在此之前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几乎没有系统的理论,一些真知灼见散见于各种古代典籍之中,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也未能合拍。《马氏文通》一书有首创之功,它的研究对象是古典的(先秦两汉古文),研究方法是模仿的(模仿拉丁语法),研究目的是实用的(为了节省青年学生学习、掌握古代文言的时间,以便腾出更多时间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此后 20 年中,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一直走着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的道路。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难当头。1938—1941 年间,以陈望道、方光焘、傅东华、金兆梓为首的一大批语言学家在上海进行了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呼吁建立以中国文法事实为基础的中国文法新体系,猛烈抨击当时的复古思潮,积极维护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成果。这次文法大讨论与当时上海左联作家抗战文艺遥相呼应,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文法革新大讨论后,王力先生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先生出版了《汉语语法论》,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一书更是受丹麦语言学家耶思泊森(Jespersen)的影响,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词句论》从形式研究意义,即从 O→I,下

卷《表达论》从意义研究形式,即从 $I \rightarrow O$, 成为第一部对汉语进行语义研究的专著。

不过总的说来,20 世纪初开创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一直以语法研究为中心,从《马氏文通》到改革开放前出版的各种汉语语法和语言学论著,大都受西方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影响,注重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概念和术语,精心筹建中国汉语语言学大厦。这段时间的汉语研究既有成绩也有不足,即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影响较深,忽略了语言意义和功能的研究,缺乏以汉语为本体的语言哲学,未能深入揭示汉语自身的人文属性。尽管建国以来的 50 年现代汉语语言学研究以描写和转换为主,但对汉语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从未中断。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析句讨论中,复旦大学胡裕树教授主张汉语研究应该把形式、意义和内容结合起来进行,指出语言研究分语法层面、语义层面和语用层面,其理论上的敏锐和创新使他成为海派语言学第二代的旗手,与北派的朱德熙先生分执牛耳。以海派为代表的一部分语言学家实际上已经和国际上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潜流不谋而合,大家都反对把语言看成一个与社会文化剥离的纯粹的符号系统,大家都主张对语言进行宏观的动态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音位——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六个层面,在句子层面以上大家还看到了语篇,一致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是不全面的,对语言规则的掌握其实是一种语法能力(a competence for grammar),而对语言使用规则的掌握则是一种运用能力(a competence for use),只有当这两种能力互相补充,语言学习者才能完全掌握一套语言符号系统,并且正确使用它进行得体的跨文化交际。

结构主义语言学把形式与意义分割开来,不讲语言形式的

语义功能,只研究其分类和分布,把考察历史演变的诸语言研究转化为某一种语言的静态研究,走上了语言内向研究的道路。中国文化语言学和英汉对比语言学则引导人们对汉语进行外向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语言和文化相互制约,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一个民族的语言特点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特点,一个民族的精神特点反过来也能模塑一个民族的语言特点,只有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从文化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一个民族的语言现象和文化属性,同时又以语言为媒介来阐释文化、探究语言现象中隐含的民族文化心理,并辩证地对待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把中国文化引入中国语言研究领域,才能正确、全面、深刻地认识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才能有利于我们汉语研究和外语教学,才能以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逐步建立以中国汉语语言事实为基础、引进西方当代语言学理论、认真吸收前人灼见、摆脱西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建立起符合汉语事实的中国语言学理论。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延续了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开创的语言学人文主义研究传统,糅合了西方当代社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等众多新兴学科的优良传统。随后于20世纪90年代方兴未艾的中外对比语言学理论则把中国文化语言学进一步推向深入,中国一大批从事对比语言学研究的专家们皓首穷经,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切实可行的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研究语言和文化、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杨自俭教授认为,所谓英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兼有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主要任务是

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同,然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应用领域,为外语教学、英汉互译和词典编纂服务。90年代以来英汉对比研究专家和学者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5部,其中赵世开教授的《汉英语对比语法论集》、杨自俭教授的《英汉语比较与翻译》、潘文国教授的《汉英对比纲要》、许余龙教授的《对比语言学概论》、连淑能教授的《英汉对比研究》、罗选民教授的《英汉文化对比与跨文化交际》、郭著章教授的《翻译名家研究》等几部著作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获得同行好评。

从整体而言,80年代的英汉语对比研究以微观研究为主,主要在语言、词汇和语法方面,90年代的对比研究已扩大到句群、语篇、修辞、文体和语用等层次。目前,学者们正从英汉对比语法学、英汉对比语音学、英汉对比语义学、英汉对比词汇学、英汉对比语篇学、英汉对比语用学、英汉对比文体学、英汉对比修辞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并成果迭出,如陆国强教授出的《英汉和汉英语义结构对比》,钱冠连教授出的《汉语语用学概论》,胡曙中教授出的《英汉对比修辞学》,彭维宣教授出的《英汉语篇综合对比》,邵志洪教授出的《英汉语研究与对比》。本书中我们主要从词语角度进行英汉语对比研究。

三、本书撰写的初衷和原则

近十多年来,外语界,尤其外语教育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结合才有利于外语教学、有利于翻译、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尽管人们知道文化知识学习的重要性,但目前我国出版这类书籍比较少,仅有零散的文章见于报刊杂

志,很难满足外语教学对文化知识的需求,因此,我们几年前就着手这本《英汉词语文化对比》的编撰工作。

英汉词语文化对比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既涉及英汉语言,又涉及英汉民族文化。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举,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人类为认识自我所研究的对象。人类对语言的研究由来已久,语文学传统(Philological Tradition)强调语言的天然属性,将语言看成是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系统,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独立的跨人文和自然学科的边缘学科。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特别是自20世纪初博厄斯和萨丕尔(Edward Sapir)以来,人类语言学传统(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和社会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因此,人们视语言学为社会科学,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进行研究。随后出现的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强调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和研究语言及其交际过程,认为语言交际过程不仅涉及语言系统,而且涉及与语言系统密切相关的文化系统。人们在对话言和文化的研究上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即研究语言对文化和文化对语言的彼此影响;其二是研究文化中的语言,即研究不同文化的语言问题。前者将语言和文化置于并列地位,后者将语言置于从属地位。本书的研究两者兼蓄,既研究英汉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又探讨英汉文化中的两种语言问题。我们不仅从语言的棱镜中去审视英汉民族的文化,而且从英汉民族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英汉两种语言的言问题。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对语言有着密切的影响。语言中受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词汇,文化对词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词义上,词的联想意义受文化影响最大。词的联想意义包括词的

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和搭配意义。英汉文化的不同造成两种语言间词语的联想意义的差异,而其差异也反映出两种文化的不同。由于英汉词汇数量巨大,我们力求通过选择富有文化内涵的词语,举一反三,让读者从中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试图探讨英汉词语国俗语义差异的表现形式,即英汉语义重合、语义错位、语义空缺、语义对应、语义碰撞,等等;探究形成这些差异表象的深层原由,揭示出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探讨在跨文化交际、英汉互译、外语教学中需注意的问题。

本书主要由张安德和杨元刚撰写,第七章和第八章由李志强执笔,第5章由胡平执笔,张安德和杨元刚分别对全书作了多次修改,最后由张安德统稿完成。

大连外国语学院张后尘教授审读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连淑能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湖北大学科研处把本课题作为专题研究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湖北教育出版社领导以及本书责编傅华文女士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密切合作,在此,我们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和资料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张安德 杨元刚

2002年2月